

城镇安置模式下易地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研究

——基于湖南省 445 个微观农户数据

匡远配, 纪玉昭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基于湖南省城镇安置社区 445 户搬迁农户的微观数据, 从经济发展、社会融入和心理归属三个维度选取 15 个变量构建社会适应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熵值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城镇安置模式下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进行测算和分析, 同时引用 IPA 模型探究各评价指标对农民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大小。研究表明: 城镇安置模式下搬迁农民的社会适应性总体接近于“比较适应”水平, 经济发展适应维度的家庭人均收入、固定资产数量, 社会融入适应维度的家庭亲友中能人数量, 心理归属适应维度的对未来发展期许等指标偏低是整体处于“一般”水平的直接原因; 农民承包地退出意愿、家庭人均收入、固定资产数量、家庭亲友中能人数量和搬迁后社区活动参与等指标能否提高是影响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的关键变量。

关键词: 易地搬迁; 社会适应性; 城镇安置; 移民; 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3)01-0054-10

Relocated farmers's social adaptability under the urban resettlement mode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445 farmers in Hunan province

KUANG Yuanpei, JI Yuzhao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 data of 445 relocated farmers in urban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in Hunan Province, 15 variables are sele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ttribution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ocial adaptability.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relocated farmers under the urban resettlement mode is measured and analyzed by entropy method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Simultaneously, IPA model is adopt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ach evaluation index on the relocated farmers' social adaptabil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the relocated farmers under the urban resettlement mode is generally close to the "relatively adaptive" level. The overall "average" level directly result from the lower indexes such as the per capita income and fixed assets of the family in the dimens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daptation, the number of capable people in the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in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integration adaptation, and the expecta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dimension of psychological attribution adaptation. Whether the indicators such as farmers' willingness to withdraw from contracted land, per capita family income, the number of fixed assets, the number of capable people in family members,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after relocation can be improved is the key variable to improve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of relocated farmers.

Keywords: relocation; social adaptability; urban resettlement; immigr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收稿日期: 2022-11-0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73042, 71473080);
湖南省社科重点项目(21ZDB014)

作者简介: 匡远配(1973—), 男, 湖南武冈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落实搬迁群众户籍管理、合法权益保障、社会融入等工作举措,提升安置社区治理水平”,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

能致富。自 2020 年全国完成 960 多万贫困户易地搬迁任务后,提升搬迁农民的社会适应能力,促使搬迁农民在迁入地实现收入增加、社会融入和心理适应,已成为新阶段的重要工作任务。

目前关于易地搬迁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户搬迁影响因素^[1-3]、搬迁后农地处置^[4-6]、绩效评价^[7,8]、农户可持续生计^[9,10]以及人力资源开发^[11,12]等方面。尽管易地搬迁总体上改变了农民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对提高农民收入、改善生计状况作用甚大,但也可能使其面临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多重考验^[13],出现社交边缘化^[14]、心理认同弱质化^[15]等问题。另外,相对中心村安置模式,占搬迁总人口 52%的城镇安置^①模式并不符合以往就地就近安置的惯性思维,更容易造成社会适应性的欠缺^[16-19]。

目前移民社会适应性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进城农民工和生态移民群体。叶俊焘等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融合主要面临经济融合、社会交往融合和心理认同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经济融合极大制约了城市融合的纵向提升^[15]。司文涛等将农民工社会适应维度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并分析了心理资本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路径^[20]。史梦薇等认为生态移民迁移后会经历经济适应、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应等一系列的社会适应过程,其中心理适应是移民实现社会适应的关键^[21]。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易地搬迁的研究大多关注搬迁农民的生计转换,相对忽视了移民社交和心理层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城镇安置模式下易地搬迁农民的社会适应性研究付诸阙如。鉴于此,笔者拟基于湖南省 445 户搬迁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从经济发展、社会融入和心理归属三个维度选取 15 个变量构建社会适应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农民社会适应性进行测算和分析,同时引用 IPA 模型探究社会适应性各变量的影响大小,以期为易地搬迁后续帮扶和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二、社会适应性理论框架与分析

易地搬迁中的城镇安置模式实施的目的是将缺乏生存条件、难以有效率地实现就地脱贫的建档立卡人口,通过搬迁的方式实现家庭城镇化和搬迁农民市民化。易地搬迁的要求是“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想要达到“搬得出”的结果,不仅需要农民自身具有强烈的主动搬迁意愿,还需要地方政府制定有利的配套政策和在迁入地提供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稳得住”“能致富”则涉及搬迁农民在安置区内经济发展、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等方面的适应性问题^[15,20,21]。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要是人的最低需求层次,必须依靠一定的经济基础来保障。所以农民在迁入城镇后,家庭经济生活方面能否改变原有生计方式以顺利适应城镇生活,是搬迁农民社会适应的第一步。在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则需要考虑搬迁农民社会融入方面的适应性,包括加强沟通交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在与城镇居民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了解和顺应当地文化,获得本地人的认可。在马斯洛需求理论中,自我实现需要是人的最高需求层次,就搬迁农民的角度而言,在心理上由农民身份转向城镇居民身份是其实现个人价值的标志。因此,农民搬迁到城镇后主观感受、心理融合、社区认同在内的“我群感”“归属感”的建立是移民适应次序的最后环节^[22],能取得对自己新身份的认同,从而获得归属感。移民的社会适应性不仅意味着他们地理位置迁移后对新空间的适应,更意味着其行为方式、思维习惯等方面的相应转变和心理感受上的认同^[23]。基于此,搬迁农民在城镇安置后社会适应的主要内涵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经济发展适应是前提条件,社会融入适应是发展载体和重要内容,心理归属适应是实现社会适应的标志,具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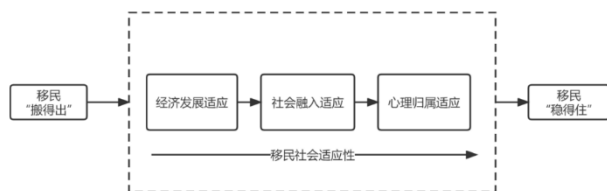


图 1 易地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理论框架

(一) 经济发展适应性

经济发展适应是指农民迁移到城镇后根据自身资源禀赋转变自身生产生活方式,并逐步缩小和城镇居民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别,是其立足城镇的基础^[24]。经济发展适应性主要从家庭居住条件、家庭经济收入、信贷能力水平、固定资产以及家庭劳动力数量等方面衡量。解决住房问题是城镇安置移民实现经济发展、融入城镇生活的前提^[25]。住房意味着“家”,如果不能解决住房问题,移民就很难

在生活上安定下来。搬迁农民的原家庭住房质量或者地理位置较差,而迁移到城镇后,统一分配为砖混结构的楼房,住房条件获得明显提升,有利于搬迁农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是城镇安置移民实现经济发展、融入城镇生活的基础,是直接体现家庭经济状态的指标^[26]。移民搬迁后原有生计方式和经济生产结构被打破,其家庭经济收入会有很大影响,在短期内经济发展适应性会陷入困境。但从长期来看,城镇安置移民搬迁时间越久,移民经济收入往往越稳定,社会适应状况逐渐会向好的方向发展^[24,25]。固定资产和信贷能力是城镇安置移民实现经济发展、融入城镇生活的重要保障,可以帮助搬迁农民应对环境变化和外力冲击。通过提升物质资产水平、积累金融储蓄能力、增强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搬迁农民经济适应能力的提高^[4]。家庭劳动力是城镇安置移民实现经济发展、融入城镇生活的根本保证。只有确保家庭劳动力稳定就业,才能实现稳定增收和稳定脱贫,为社会适应性提高奠定基础。家庭劳动力数量对搬迁农民从事兼业、非农型生计有明显推动效用^[27],其家庭劳动力比重越大,越有利于促进家庭生计转型的整体实现,越容易适应迁入地经济发展。

(二) 社会融入适应性

社会融入适应是社会适应性的重要内容,实质上是搬迁农民社会网络得以恢复和扩展。搬迁后与亲友的联系、外部社会资源、与迁入地邻里的关系、与迁入地居民的社会交往都会对城镇安置移民的社会融入适应性造成影响。搬迁后保持与亲友的联系是城镇安置移民融入城镇、重构社会网络的重要前提,能够为移民提供初始社会资本^[15]。亲戚朋友为搬迁农民提供情感、物质、信息及陪伴等社会支持,是移民实现社会融入适应的后备支撑。外部社会资源是城镇安置移民融入城镇、重构社会网络的强大动力。搬迁后农民会面临城市无所不在的压力,不但需要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还需要方方面面外部社会资源的帮助,从而提高其社会适应水平。与迁入地邻里关系融洽是城镇安置移民融入城镇、重构社会网络的直接动力。农民搬迁后邻里之间通过帮忙照看小孩、借贷资金、互赠食品衣物等方式相互帮助,有助于消除搬迁农民初到城镇的紧张不安感,增强社区认同感,扩大社会网络,更快

地实现社会融入。与迁入地居民的社会交往是城镇安置移民融入城镇、重构社会网络的重要突破。在搬迁前,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纽带表现为强连带性^[27],而搬迁后生活生产空间的变化致使移民因为熟人社会的记忆解构更容易陷入社交适应困境^[28],如果只和迁入地其他移民交往,形成的社会网络质量相对较低,所以想要达到较高水平的社会融入适应必须在重构社会网络时打上新环境的“印记”。

(三) 心理归属适应性

心理归属适应是指搬迁农民在情感和心理上取得对自己新身份的认同,对安置地社会产生归属感,是其社会适应的最高形态^[15]。心理归属适应性主要是从依赖心理、对移民政策的态度、社区活动参与、对承包地处置意愿等方面体现的。搬迁农民的依赖心理在城镇安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如果不能改变可能存在的“等靠要”思想,那就无法适应城镇新环境,无法实现最终的心理适应。认同当地政府实施的扶持政策是城镇安置移民实现心理认同的关键因素,由移民参与制定的科学合理的扶持政策有利于提高其归属感和心理认同,降低移民社会适应难度。反之,如果政府的扶持政策偏离实际或不适用于当前条件,则会给移民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29],势必增加移民社会适应的难度。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同样是城镇安置移民实现心理认同的重要体现。当移民的行为方式与思维习惯逐渐适应安置地的新环境、能够在心理上认同自己新的身份时,才能真正适应搬迁后的生产生活^[29]。另外,承包地的合理处置是城镇安置移民实现心理认同的重要体现。承包地对于移民社会适应性的影响除了生计方式和社会保障外,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依赖。对土地的感情让移民难以真正融入城镇生活,想要达到市民化、实现移民心理适应的目的,必须及时引导和转变搬迁农民的思维和情感倾向,尽量降低承包地对搬迁农民心理归属适应性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为获得城镇集中安置区搬迁农户的微观数据,笔者分别于2021年1月13~15日和10月14~17日到湖南岳阳市和怀化市城镇集中安置社区进行调研。其中位于岳阳市的洪家垅安置小区是湖南省安

置人口最多的易地搬迁安置区，位于怀化市的太安社区则是湖南省占地面积最大的易地搬迁安置区。另外，岳阳市和怀化市作为湖南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移民人数最多、计划建设规模最大、配套设施复杂的两个地区，均采取城镇安置模式逐步达成了搬迁农民充分就业、配套设施齐全、社区治理有效、脱贫致富见效的目标，其经验对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助力推动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是研究城镇安置模式下易地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的最佳样本地。考虑到湖南省安置区规模、安置模式以及样本调研数据的难易程度，采取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对安置区的搬迁户进行调查，覆盖了麻溪铺镇、北溶镇、官庄镇、梅仙镇、三阳镇、大洲镇、三墩镇等十余个镇，调查以户为单位，调查对象是家庭户主或主要劳动力。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 486 份，经过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 445 个调查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在调查对象性别方面，男女比例大致为 6:4，比例相对均衡，性别结构合理。被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 20~65 岁，平均年龄 50.85 岁。在调查对象民族构成方面，受访者汉族与少数民族比例约为 4:1，高于全省汉族与少数民族比例（约为 9:1）。文化程度方面，文盲、小学、初中约占 88.1%，说明调查对象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调查对象家庭规模方面，1~3 人家庭占比 24.94%，4~7 人家庭占比 73.93%，8 人以上家庭占比 1.12%。调查结果见表 1。

表 1 易地搬迁农民家庭基本特征

样本指标	样本数	占比/%
被访者性别	男	263 59.10
	女	182 40.90
被访者年龄	18 岁及以下	4 0.90
	19~35 岁	62 13.93
	36~50 岁	160 35.96
	51~65 岁	132 29.66
	66 岁及以上	87 19.55
民族	汉族	354 79.55
	少数民族	91 20.45
	0 年	31 6.97
受教育年限	1~6 年	192 43.15
	7~9 年	169 37.98
	10 年及以上	53 11.90
	1~3 人	111 24.95
家庭人数	4~7 人	329 73.93
	8 人及以上	5 1.12

(二) 指标赋值及其权重

借鉴已有生态移民^[30]及水库移民^[31]社会适应性的研究成果，咨询了移民生计研究、贫困问题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安置区搬迁农民自身资源禀赋、安置区现状、风俗习惯等因素，设计了城镇安置模式下易地搬迁移民社会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3 个一级指标和 15 个二级指标（表 2）。

表 2 易地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经济发展适应性 (E ₁)	住房质量改善 (A ₁)	0.0409
	信贷能力水平 (A ₂)	0.0431
	家庭人均收入 (A ₃)	0.0730
	劳动力人口占比 (A ₄)	0.0580
	固定资产数量 (A ₅)	0.0734
社会融入适应性 (E ₂)	搬迁后对迁入地居民信任程度 (B ₁)	0.0465
	与现居住地邻里街坊相互帮助频率 (B ₂)	0.0423
	搬迁后亲友可信度 (B ₃)	0.0210
	与现居住地邻里街坊熟悉程度 (B ₄)	0.0387
	家庭亲友中能人数量 (B ₅)	0.1860
心理归属适应性 (E ₃)	对未来发展期许 (C ₁)	0.0600
	对扶持政策总体满意度 (C ₂)	0.0276
	搬迁后社区活动参与 (C ₃)	0.1147
	搬迁后承包地经营意愿 (C ₄)	0.0349
	搬迁后承包地退出意愿 (C ₅)	0.1397

1. 经济发展适应性

选取经济发展适应性作为一级指标，住房质量改善、信贷能力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人口比重、固定资产数量为二级指标，预期方向均为正。对于迁入地住房质量改善，赋值标准是如果搬迁前房屋主结构为茅草房或是无房户，则房屋质量改善赋值为 5；主结构为石头房，房屋质量改善赋值为 4；主结构为土木，房屋质量改善赋值为 3；主结构为砖木，房屋质量改善赋值为 2；主结构为砖混结构，房屋质量改善赋值为 1。对于信贷能力水平，通过“是否参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否参与商业保险，如急需用钱是否能从亲友借到钱，是否能从银行、信用社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到钱”四个问题进行衡量，将“否”和“是”分别赋值为 0 和 1，相加获得 0~4 五种情况；对于家庭人均收入、固定资产数量和劳动力人口比重等变量，根据实际情况将其分成五级不同的区段。

2. 社会融入适应性

选取社会融入适应性为一级指标，搬迁后对迁

入地居民信任程度、与现居住地邻里街坊相互帮助频率、搬迁后亲友可信度、与现居住地邻里街坊熟悉程度、家庭亲友中能人数量为二级指标,预期方向均为正。其中搬迁后对迁入地居民信任程度、亲戚朋友可信度、与现居住地邻里街坊熟悉程度、相互帮助频率四个变量作为衡量指标,指标评价均采用五级量表进行评价。家庭能人数量则是指在政府部门、学校、医院等工作的亲戚朋友数量,本研究根据实际情况将其分成五级不同的区间段。

3. 心理归属适应性

选取心理归属适应性作为一级指标,对未来发展期许、对扶持政策总体满意度、搬迁后社区活动参与、搬迁后承包地经营意愿、搬迁后承包地退出意愿作为二级指标,预期方向均为正。对未来发展期许和对扶持政策的总体满意度,根据其评价范围“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与“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5。对于搬迁后社区活动参与,通过“是否参与居住地村(居)委会选举投票”“觉得自己与安置区以外的县城居民有无差异”“搬迁后户主是否变换工作”“是否愿意参加社区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如跳广场舞或者其他)”四个问题来测度,将“否”和“是”分别赋值为0和1,相加获得0~4五种情况。对搬迁后承包地经营意愿为不想种地的赋值为5,承包地经营意愿为想种一部分的赋值为4,想自己土地全部种的赋值为3,想转入土地大规模耕种的赋值为2,其他的赋值为1。通过“是否愿意退出承包地换取一次性补偿”“是否愿意退出承包地换取每月工资性补偿”“是否愿意退出承包地换取养老保险和其他城镇社会保险”“是否愿意在60岁后将承包地退给集体并获得像城里人一样的养老保障”四个问题测度搬迁农民承包地退出意愿,将“否”和“是”分别赋值为0和1,相加获得0~4五种情况。

(三) 模型构建

1. 确定评价因素集及评语等级

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将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评价因素集分为二级,设一级指标集为 $E = \{E_1, E_2, E_3\}$,二级指标集为 $E_1 = \{A_{11}, A_{12}, A_{13}, A_{14}, A_{15}\}$, $E_2 = \{B_{21}, B_{22}, B_{23}, B_{24}, B_{25}\}$, $E_3 = \{C_{31}, C_{32}, C_{33}, C_{34}, C_{35}\}$ 。评语等级 $V = \{V_1, V_2, \dots, V_m\}$, m 为评语等级数量。将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

评价分为五个等级: $V_1 =$ 非常差, $V_2 =$ 较差, $V_3 =$ 一般, $V_4 =$ 较好, $V_5 =$ 非常好。将对应评语集 $[V_1, V_2, V_3, V_4, V_5]$ 分别赋值 $[1, 2, 3, 4, 5]$ 。

2. 熵值法确定权重集

为消除物理影响,使不同单位之间的调查数据能够在同一层面进行比较,对数据实施无量纲化处理。采用极值标准化将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使得原始数据最终值限制在 $[0,1]$ 之间。基本模型公式为:

$$X_{ij} = \frac{X_{ij} - X_{\min}}{X_{\max} - X_{\min}} \quad (1)$$

当指标与社会适应性为负相关时,则上式变为:

$$X_{ij} = \frac{X_{\max} - X_{ij}}{X_{\max} - X_{\min}} \quad (2)$$

同时为使得数据运算有意义以及消除零的影响,需对无量纲化后的标准数据进行整体平移,即 $X_{ij} = X_{ij} + \alpha$ 。为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数据, α 的取值必须尽可能小,因此取 $\alpha = 0.0001$,最终得到整体平移后的无量纲化标准数据。

为了得到生计资本较为客观的评价权重,采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具体步骤如下:

将各测量指标数据按二级指标分类排列,构建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指标的判断矩阵:

$$M = \begin{matrix} A_1 \\ A_2 \\ \vdots \\ A_m \end{matrix} \begin{bmatrix} x_{11} & x_{12} & \cdots & x_{1n} \\ x_{21} & x_{22} & \cdots & x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x_{m1} & x_{m2} & \cdots & x_{mn} \end{bmatrix}$$

P_{ij} 表示第 i 个被评价对象第 j 个指标值在所有被评价对象第 j 个指标值总和中的比重或贡献度,计算公式为:

$$P_{ij} = \frac{X_{ij}}{\sum_{i=1}^m X_{ij}} \quad (3)$$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公式为:

$$E_j = -K \sum_{i=1}^m P_{ij} \ln(P_{ij}) \quad (4)$$

差异性系数计算公式为:

$$D_j = 1 - E_j \quad (5)$$

最后确定每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w_j :

$$W_j = \frac{D_j}{\sum_{j=1}^n D_j} \quad (6)$$

得出各级指标权重集如下： $W=(0.288361, 0.334629, 0.377011)$ ； $W_1=(0.040893, 0.043123, 0.073025, 0.057951, 0.073369)$ ； $W_2=(0.046542, 0.042337, 0.021037, 0.038749, 0.185964)$ ； $W_3=(0.059980, 0.027647, 0.114737, 0.034948, 0.139698)$

得出各级指标权重集如下： $W=(0.288361, 0.334629, 0.377011)$ ； $W_1=(0.040893, 0.043123, 0.073025, 0.057951, 0.073369)$ ； $W_2=(0.046542, 0.042337, 0.021037, 0.038749, 0.185964)$ ； $W_3=(0.059980, 0.027647, 0.114737, 0.034948, 0.139698)$

四、社会适应性测算及其结果分析

(一) 社会适应性测算

构建评价指标模糊关系矩阵 $R_i=(r_{ij})$ ，
 $i=1,2,\dots,m, j=1,2,\dots,n,$
 $\sum_{j=1}^n r_{ij}=1$

$$R = \begin{pmatrix} r_{11} & r_{12} & \dots & r_{1n} \\ r_{21} & r_{22} & \dots & r_{2n}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r_{m1} & r_{m2} & \dots & r_{mn} \end{pmatrix}$$

根据数据可得出每个指标 E_{ij} 隶属于评价集 V 的评价次数占总评价次数的比例，即 r_{ij} 。然后利用模糊综合评价得出易地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模糊关系矩阵（表 3）。

表 3 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数据汇总（评价次数）

	非常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非常好
住房质量改善	38	18	369	2	18
信贷能力	8	117	188	126	6
家庭人均收入	20	161	152	63	49
劳动力人口占比	12	112	180	92	49
固定资产数量	31	198	122	77	17
搬迁后对迁入地居民信任程度	20	35	160	182	48
与现居住地邻里街坊相互帮助频率	13	45	158	184	45
搬迁后亲友可信度	0	11	100	223	111
与现居住地邻里街坊熟悉程度	9	42	125	208	61
家庭亲友中能人数量	342	53	21	13	16
对未来发展期许	14	109	157	116	49
对扶持政策总体满意度	6	21	124	241	53
搬迁后社区活动参与	10	97	149	159	30
搬迁后承包地经营意愿	0	5	79	45	316
搬迁后承包地退出意愿	95	37	47	34	232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得出经济发展适应性、

社会融入适应性、心理归属适应性各项指标层的单因素模糊关系矩阵 R 。

$$R_1 = \begin{pmatrix} 0.085 & 0.040 & 0.829 & 0.004 & 0.040 \\ 0.018 & 0.263 & 0.422 & 0.283 & 0.013 \\ 0.045 & 0.362 & 0.342 & 0.142 & 0.110 \\ 0.027 & 0.252 & 0.404 & 0.207 & 0.110 \\ 0.070 & 0.445 & 0.274 & 0.173 & 0.038 \end{pmatrix}$$

$$R_2 = \begin{pmatrix} 0.045 & 0.079 & 0.360 & 0.409 & 0.108 \\ 0.029 & 0.101 & 0.355 & 0.413 & 0.101 \\ 0 & 0.025 & 0.225 & 0.501 & 0.249 \\ 0.020 & 0.094 & 0.281 & 0.468 & 0.137 \\ 0.769 & 0.119 & 0.047 & 0.029 & 0.036 \end{pmatrix}$$

$$R_3 = \begin{pmatrix} 0.031 & 0.245 & 0.353 & 0.261 & 0.110 \\ 0.013 & 0.047 & 0.279 & 0.542 & 0.119 \\ 0.022 & 0.218 & 0.335 & 0.357 & 0.067 \\ 0 & 0.011 & 0.178 & 0.101 & 0.710 \\ 0.213 & 0.083 & 0.106 & 0.076 & 0.521 \end{pmatrix}$$

对准则层以及最终的评价集去模糊化，公式为：

$M = W \times R = (w_1, w_2, \dots, w_m) \times R = (\bar{M}_1, \bar{M}_2, \dots, \bar{M}_n)$
 分别得到准则层各指标的评价集及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的综合评价集。

$$M_1 = W_1 \times R_1 = [0.014, 0.087, 0.121, 0.047, 0.019]$$

$$M_2 = W_2 \times R_2 = [0.147, 0.034, 0.056, 0.071, 0.027]$$

$$M_3 = W_3 \times R_3 = [0.035, 0.053, 0.088, 0.086, 0.115]$$

$$M = W \times R = [M_1 \ M_2 \ M_3 \ M_4]^T$$

$$= (0.196, 0.174, 0.265, 0.204, 0.161)$$

设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总的评价分数为 Y ，根据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M 和评语等级矩阵 V ，运用公式 $Y = M \cdot V = (\bar{M}_1, \bar{M}_2, \dots, \bar{M}_n) \cdot [v_1, v_2, \dots, v_n]$ 得到综合评分：

$$Y_1 = 1 \times 0.014 + 2 \times 0.087 + 3 \times 0.121 + 4 \times 0.047 + 5 \times 0.019 = 0.834$$

$$Y_2 = 1 \times 0.147 + 2 \times 0.025 + 3 \times 0.102 + 4 \times 0.117 + 5 \times 0.030 = 1.121$$

$$Y_3 = 1 \times 0.035 + 2 \times 0.053 + 3 \times 0.088 + 4 \times 0.086 + 5 \times 0.115 = 1.324$$

$$Y = 1 \times 0.196 + 2 \times 0.174 + 3 \times 0.265 + 4 \times 0.204 + 5 \times 0.161 = 2.96$$

(二) 测算结果分析

从上述总的隶属度和社会适应性评价价值计算结果看，“非常好”的评价标准为 0.161，“较好”的评价标准为 0.204，“一般”的评价标准为 0.265，

“一般”及以上达到 0.630, 且评价值为 2.96, 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整体评价较高, 接近于“比较适应”水平。从各一级指标的评价分数看, 经济发展、社会融入、心理归属适应性的评价分数分别为 0.834、1.121、1.324, 表明搬迁后农民心理归属适应性最高, 而经济发展适应性最低。具体来看各指标的“一般”以上评价比例均达到 85%以上, 意味着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各指标情况较好。参照各指标评价价值的高低, 结合调研, 进一步对经济发展、社会融入、心理归属适应性三个指标评价结果进行分析。

1. 经济发展适应性

经济发展适应性评价分数为 0.834, 该维度中评价价值偏低的指标主要是“家庭人均收入”和“固定资产数量”。

家庭人均收入指标中“较差”和“非常差”的评价价值分别为 0.362 和 0.045。从农民搬迁前后的生产生活开支比较来看, 农民搬迁到城镇后, 生产生活开支种类和数量增多, 主要体现在水费、物业费、燃气费等新增费用。通过分析收入来源发现, 由于迁出地距迁入地较远, 劳动成本与时间成本上升, 但农业产出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 导致搬迁农民的农业净收益降低, 在当地从事私营活动或务工成为城镇安置移民的理性选择。调查发现, 73.71%的移民家庭在搬迁后不再继续耕种土地, 而是选择了其他生计方式。但搬迁农民缺乏在城镇生活的职业技能, 只能在劳动密集性企业中从事建筑、缝纫、水电等低收入的重复性工作。虽然安置点会不定期举办电焊、电工、家政、缝纫等职业技能培训, 但青壮年劳动力平时多数在外务工, 难以接受相关培训, 而且搬迁农民文化程度相对不高, 很难在较短时间内熟练掌握培训技能, 从而影响了搬迁农民的经济收入。

固定资产数量指标中“较差”和“非常差”的评价价值分别为 0.445 和 0.070。移民搬迁后统一新建的楼房均为砖混结构, 相比起原住房更加结实、美观和舒适, 原无房户和危房户的物质资本提升尤其明显。但楼房面积相对较小, 调查显示, 61.35%的农户搬迁后人均住房面积减少, 10.56%的农户搬迁后人均住房面积不变, 仅 28.09%的农户搬迁后住房面积增加。相比迁出地的住房, 楼房的功能相对受

限, 房内无法存放农用机械和农具, 又由于宅基地复垦、搬迁距离远和运输成本高, 搬迁农民往往会丢弃、赠送或出售贱卖自己的农用机械和农具, 固定资产的资本存量有所降低。

2. 社会融入适应性

社会融入适应性评价分数为 1.121, 该维度中评价价值偏低的指标主要是“家庭亲友中能人数量”, 指标中“较差”和“非常差”的评价价值分别为 0.119 和 0.769。一方面, 搬迁前大多数农户居住在偏远地区, 社会关系网络以地缘和亲属关系为主, 社会资本存量相对较少, 搬迁到城镇后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受到了影响, 而重构社会网络时间较长, 潜在地增加了搬迁农户的返贫风险。在访谈中发现, 部分农民搬迁后与以往邻居往来较少, 与原村庄的朋友由于距离限制往来也有所减少, 在社会交往中出现明显的“封闭性心态”。而同时, 搬迁农户子女在社会融入方面明显超过其父母, 因为搬迁农户子女的就学与就业和迁入地原居民完全一致, 其消除掉陌生感后更容易适应当地社会生活。另一方面, 搬迁农民和迁入地居民社会交往展现出良好的适应性, 对邻里关系的满意度也比较高, 在保持原有人际往来的同时并不排斥与新环境中的陌生人进行交往。另外, 家庭亲友中能人数量虽然对于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有较大影响, 但并不会因为搬迁而产生明显变化, 对于社会资源匮乏的搬迁农民而言, 其自身外部社会资源难以获得迅速提升。

3. 心理归属适应性

心理归属适应性评价分数为 1.324, 在三个维度中分值最高, 该维度中评价价值偏低的指标主要是“对未来发展期许”, 指标中“较差”和“非常差”的评价价值分别为 0.245 和 0.031。通过分析城镇安置移民的心理归属适应性发现, 农民搬迁到城镇后对迁入地的心理适应良好。搬迁农民虽然缺少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但对于安置区的整体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感到满意。调查发现, 虽然 20.90%的调查对象依旧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但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与安置区以外的县城居民没有差异, 已经是一个“城里人”了, 移民情结较弱, 有利于其融入当地社会, 实现心理层面的适应。当被问到“是否已经习惯县城的生活方式?”时, 93.48%的搬迁农民认为自己已经适应了城镇生活, 说明移民对于城镇

安置的可接受度高,愿意接受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访谈中也发现有少部分农民满足于现状,在完成脱贫后依旧希望长期享受政府补贴政策,这说明脱贫攻坚中实际存在的“保姆式”帮扶严重打击了这部分搬迁农民内生动力的建设。如果无法摆脱“福利依赖”心理,搬迁农民自身主动性会受到严重削弱,不利于在迁入地的心理适应,进而影响经济发展适应和社会融入适应,因此必须正确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其摆脱心理适应困境。

(三) 社会适应性 IPA 分析

为比较不同维度的重要度和社会适应性水平,直观地识别影响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的优劣势,本研究通过 SPSS20.0 软件对其进行 IPA 分析。将城镇安置移民社会适应性各指标组合权重总平均值 0.067,社会适应性总平均值 3.250,作为纵横轴的分割点,将 15 个指标分为 4 个象限进行重要性和社会适应能力测评,具体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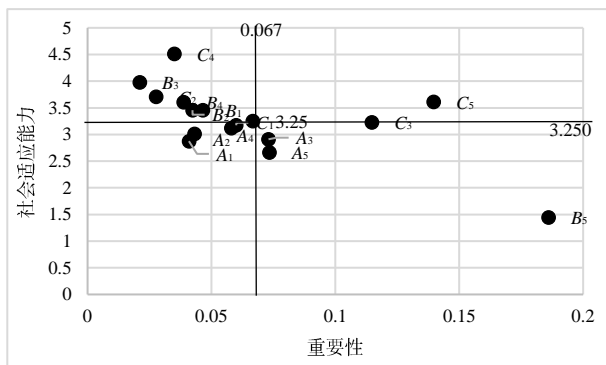


图 2 重要性—社会适应能力 IPA 象限图

第I象限为高重要性高供给区,也是继续保持区,在这一象限的指标是“搬迁后承包地退出意愿”(C₅),农民在易地搬迁后,依然把自己的承包地看作最重要的生计资产之一,但由于距离较远继续耕种困难,农地流转市场不规范、不完善,原承包地抛荒闲置问题严重。且由于搬迁到城镇后农民的非农收入比重较高,农地收入功能和就业功能逐渐减弱,所以其观念发生了转变,希望将自然资本置换为在城镇发展的启动资金,对农地保障功能的需求转变为对财产功能的需求,搬迁农民退出承包地意愿强烈。

第II象限为低重要性高供给区,属于供给过度区,是搬迁农民相对较为满意的区域。搬迁后对迁入地居民信任程度(B₁)、与现居住地邻里街坊相互帮助频率(B₂)、搬迁后亲友可信度(B₃)、与现

居住地邻里街坊熟悉程度(B₄)、对扶持政策总体满意度(C₂)、搬迁后承包地经营意愿(C₄)位于这一象限。在安置初期,搬迁农民群体与本地市民群体之间、搬迁农民个体之间需要通过相互往来增强彼此熟悉程度,从而缓解并消除陌生感和隔阂。搬迁农民的人际关系作为观察社区关系的横截面,是社区网络关系的基础,改善搬迁农民与本地市民群体之间、搬迁农民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可以大大增强其社会环境适应性,并直接影响搬迁农民的社会适应性。另外,政府对搬迁农民的子女入学、健康医疗、就业和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扶持能从各方面增强搬迁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第III象限为低重要性低供给区,这一区域属于后续改进区,包括住房质量改善(A₁)、信贷能力(A₂)、劳动力人口占比(A₄)、对未来发展期许(C₁) 4 个指标。城镇安置模式下,易地搬迁的安置房由政府统一安排新建,相对于搬迁农民的原住房来说,房屋质量明显得到改善。从实际的居住状况来看,搬迁农民对于住房整体上认可度高,无论是外观、环境还是区位因素,搬迁后住房的条件都要优于搬迁前,搬迁农民的物质资本得到提升,在长期看无需再进行关注。而对于增强信贷能力、增加劳动力人口和提升未来发展期许等方面,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提升社会适应性的效果同样需要长时间的坚持才能够显现出来。

第IV象限为高重要性低供给区,属于急需改进区。对增强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来说,家庭人均收入(A₃)、固定资产数量(A₅)、家庭亲友中能人数量(B₅)、搬迁后社区活动参与(C₃)等指标的提提升十分重要,但实际这些方面却出现了供给不足。首先,家庭人均收入方面可能是由于政府搬迁前的宣传增加了农民对于收入的期望值,部分农民迁入城镇安置区后就业的不适应影响了其发展的信心。访谈中,城镇安置移民大多认为安置区物价高工资低,尽管城镇安置为搬迁农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区位条件,但搬迁农民社会适应的关键在于经济收入,是否拥有稳定的工作,是否可以通过自身劳动获取稳定的收入,收入水平是否能够满足生活需求。其次,固定资产数量方面主要是因为迁入地和迁出地距离较远且道路难行,搬迁农民原有的固

定资产均在迁出地进行了处理,搬迁后又缺少资金或时间精力未及时添置,因此固定资产数目较少。另外,搬迁农民的生活状况与其初始社会资本有密切联系,家庭亲友中能人较少的搬迁农民其未来发展信心较低,对政府依赖心理强;而家庭亲友中能人较多、能迅速找到工作的搬迁农民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最后,搬迁后农民参加社区活动目前还存在很大不足,亟需提升迁入地社区治理服务水平,强化搬迁农民的主动参与意识,促进其在安置区的心理融入。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城镇安置模式下搬迁农民的社会适应性作为研究其在迁入地“稳得住”的切入点,从经济发展、社会融入和心理归属三个维度构建农民社会适应性五级量表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IPA分析法研究搬迁农民的社会适应性问题,探究影响农民社会适应性的相关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1) 在调查样本中,虽然城镇安置模式下搬迁农民在消除心理障碍、实现心理认同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但是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入等方面依旧面临挑战。根据模糊综合评价得出的测算数据,搬迁农民社会适应性的总体评价价值为2.96,接近于“比较适应”水平。三个维度适应性评价价值由大到小依次是心理归属适应性、社会融入适应性、经济发展适应性。经济发展适应性的家庭人均收入、固定资产数量,社会融入适应性的家庭亲友中能人数量,心理归属适应性的对未来发展期许等变量偏低是城镇安置移民整体社会适应性处于“一般”水平的直接原因。

(2) 通过IPA分析可以发现,搬迁后承包地退出意愿是影响农民社会适应性的最大变量;当前急需改进和提升的变量主要集中于家庭人均收入、固定资产数量、家庭亲友中能人数量和搬迁后社区活动参与;需要通过长期发展才能改善社会适应性的变量包括信贷能力、劳动力人口占比和对未来发展期许。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落实职业培训,提高搬迁农民生存发展的内生动力。易地搬迁的核心目的在于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的关键便是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移民而言,是否拥有职业技能是其能否增收的关键^[32,33]。相关部门要积极整合就业培训资源,大力加强当地需求大、实用性强的岗位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搬迁农民收入水平、增强其就业能力,推动城镇化发展。另外,要健全后续产业扶持体系^[34],以产业项目积极引领安置后续工作,促进搬迁农民的充分就业,推动搬迁农民“市民化”和“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政策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第二,落实社会保障,减轻城镇安置移民承包地退出的后顾之忧。加强搬迁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及住房保障等方面出台专门的政策,降低其退出承包地的风险,设立搬迁农民承包地退出基金,让自愿退出承包地的搬迁农民按月领取补贴,推动农民转变生计方式,促进家庭经济收入的提升和经济发展适应能力的提高。

第三,开展社区联谊,增加城镇安置移民社会文娱活动参与的机会。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提高搬迁农民文化娱乐活动参与度,为其打破心理隔阂、重建社会网络提供机会,从而提升搬迁农民的社区认同感和自我认同感,促使其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逐步形成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的社区共同体。

第四,开展宣传教育,增强搬迁农民政治参与度。政治参与作为社区活动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搬迁农民心理适应性的关键因素。要帮助和鼓励搬迁农民参与到群众意见征集、换届选举投票等公共治理中,让其体会到自身意见的重要性,协助提高搬迁农民政治参与度,从而提升其心理归属适应能力。

注释:

- ①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伟大成就与实践经验[EB/OL].[2021-6-30].
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106/t20210630_1285081.html.

参考文献:

- [1] 蔡进,邱继勤,禹洋春,等.秦巴山区不同类型贫困户易地搬迁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418户农户调查[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11):121-132.

- [2] 施国庆, 周君璧. 西部山区农民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0(2): 23-31.
- [3] 时鹏, 余劲.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一个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架构[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1): 38-43.
- [4] 黎洁, 孙晶晶.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研究——基于陕西4个安置社区的调查[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6): 94-104.
- [5] 黎红梅, 田松鹤.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搬迁农户调查[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0(1): 39-48.
- [6] 梅淑元.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农地处置: 方式选择与制度约束——基于理性选择理论[J]. 农村经济, 2019(8): 34-41.
- [7] 李晓园, 陈颖.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易地扶贫搬迁绩效评价及政策建议——以修水县“进城入园”扶贫搬迁工程为例[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2(3): 130-137.
- [8] 谢大伟, 苏颖, 赵亮, 等. 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模式与效果评价——来自新疆南疆三地州产业扶贫的实践[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1): 8-13.
- [9] 马国璇, 周忠发, 朱昌丽, 等. 改进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对比分析——以贵州省贞丰县者相镇安置点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2, 43(5): 207-217.
- [10] 周丽, 黎红梅, 李培.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J]. 经济地理, 2020, 40(11): 167-175.
- [11] 张涛, 张琦.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就业减贫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57(4): 129-136.
- [12] 王宗强, 韩锐, 尹洁, 等. 如何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就业帮扶?——基于我国秦巴山区4县1区3015个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实证分析[J]. 科学决策, 2022(6): 34-53.
- [13] 李燕燕, 刘志山. 城市新移民身份认同的三重逻辑[J]. 湖湘论坛, 2022, 35(2): 119-128.
- [14] 聂君. 宁夏生态移民社会关系重构影响因素与干预策略研究[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3): 118-124.
- [15] 叶俊焘, 钱文荣, 米松华. 农民工城市融合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三阶段 Ordinal Logit 模型的实证[J]. 浙江社会科学, 2014(4): 86-97.
- [16] 武汉大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课题组. 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特征与后续扶持的路径选择[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12): 88-102.
- [17] 丁波. 新主体陌生人社区: 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重构[J]. 广西民族研究, 2020(1): 56-62.
- [18] 赵列. 社会信任为何利于搬迁农户的社会适应?——基于中介与调节的检验[J]. 预测, 2021, 40(5): 90-96.
- [19] 石师, 董铭, 牟涵, 等. 扶贫移民社会关系重构困境与对策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 2021, 60(16): 173-178+181.
- [20] 司文涛, 戚伟, 孟霖. 心理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理——基于地方适应性的中介效应[J]. 资源科学, 2022, 44(4): 820-832.
- [21] 史梦薇, 王炳江. 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心理适应的特征及影响因素[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0(2): 68-72.
- [22] 风笑天. “落地生根”?——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J]. 社会学研究, 2004(5): 19-27.
- [23] 冯伟林, 李树苗. 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6, 22(4): 2-9.
- [24] 杨显明, 米文宝, 齐拓野, 等. 宁夏生态移民效益评价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3, 27(4): 16-23.
- [25] 唐宏, 张新焕, 杨德刚. 农户生态移民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疆三工河流域的农户调查[J]. 自然资源学报, 2011, 26(10): 1658-1669.
- [26] HUMPHREY C, SNEATH D.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Cambridge: White Horse Press[J].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1996, 35(1): 19-23.
- [27] 沈关宝, 李耀锋. 网络中的蜕变: 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与市民化关系探析[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99-107.
- [28] 董苾茜. 扶贫移民的社会适应困境及其化解——基于社会记忆理论视角[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2): 49-54.
- [29] 乌静. 政策排斥视角下的牧区生态移民社会适应困境分析[J]. 生态经济, 2017, 33(3): 175-178.
- [30] 叶尔扎提·开恩思, 李莉, 孟梅. 塔城市库鲁斯台草原生态移民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基于邓恩公共政策评价标准[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10): 27-33.
- [31] 张丹. 水库移民城市楼房安置的社会适应性评价分析[J]. 水利规划与设计, 2019(3): 79-82.
- [32] 李培林, 王晓毅. 移民、扶贫与生态文明建设——宁夏生态移民调研报告[J]. 宁夏社会科学, 2013(3): 52-60.
- [33] 唐丽霞, 林志斌, 李小云. 谁迁移了?——自愿移民的搬迁对象特征和原因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5(4): 38-43.
- [34] 王红彦. 易地扶贫移民搬迁的国际经验借鉴[J]. 世界农业, 2014(8): 15-21.

责任编辑: 曾凡盛